

# 胤禛：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

金 承 藝

- 壹、清世宗筆下的胤禛
- 貳、「聖祖實錄」上的胤禛
- 參、大將軍的派出與皇儲之關係
- 肆、一些疑問的解決
- 伍、憂患餘生

## 壹、清世宗筆下的胤禛

胤禛，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從『胤禛』問題看清世宗奪位」一文中指出的這位清聖祖心目中的皇位繼承人，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聖祖有皇子三十五人，他是康熙帝的第二十三子。因為有些皇子早殤夭折，經過「國朝宮史」所載的「皇子命名和齒序」過程後的胤禛，排行第十四。<sup>①</sup>他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日，母為德妃烏雅氏，亦即孝恭皇后；與世宗是同母兄弟。世宗生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十日，年長他九歲有餘。

在今天可見的史料中，關係胤禛的材料已經不多，而能夠見到的有關胤禛——

①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是研究清代皇室譜系的名著之一。他在卷三「皇子譜」的聖祖諸子的後面，有一段按語說，「……皇清文獻載，雍正中皇三子允祉（康熙時封誠親王）降封郡王，冊文稱為皇考第十子。皇七子允祐（康熙時封淳郡王）晉封親王，冊文稱為皇考第十五子。皇八子允禩初封親王，冊文稱為皇考第十六子。……與現稱行次絕異。……是知世宗當日實自稱為皇十一子，並不自知為皇四子也。其改定次序，必在高宗時，嚮非冊文流傳，又烏從而見其跡也。……」按照唐先生的說法，胤祉當日既不自知為皇三子，世宗不自知為皇四子，胤禩不自知為皇八子，則胤禛自亦不自知為皇十四子了。但唐邦治這一甚關重要的立異說法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忽略了「皇子命名」規則中的「蒙賜名始稱皇幾子」的體例。自康熙時胤祉稱皇三子，胤禩（？）稱皇四子，胤禩稱皇八子，胤禛稱皇十四子是一點都不錯的。我們從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出掌故叢編中發表的影印胤禩寫給何焯的書信原件，就可以得到證明了，那上面明白的寫着「八貝勒問何先生、何二先生好」的字樣。特別是信後還有康熙帝的御書小字「八阿哥與何焯書，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足證胤禩確稱皇八子。而聖祖實錄中稱胤祉為皇三子，胤禛為皇十四子等，自為當時的實際情況，並非是後來的「改定」了。

以允禩假名代替——的記載，多為經過了世宗任意竄改的文字，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世宗實錄」中關係胤禛的重要記載：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仁壽皇太后（即孝恭皇后）——世宗和胤禛的母親，暴崩於宮中。<sup>②</sup>就在皇太后死去的這天，世宗曾下一有關胤禛的諭旨說，「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貝子允禩，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屢加訓諭，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著晉封允禩為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朕自疊沛恩澤。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禩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sup>③</sup>這是世宗奪得大位半年後，「世宗實錄」中第一次透露的他對胤禛責罵的文字。

綜觀「世宗實錄」，我們可以看出世宗對於凡是對他的篡奪皇位不甘心服的兄弟們之整肅，是有既定的時間表的。奪位之初，由於政權的不夠穩固和他對政府事務的不夠嫻熟，同時也為了博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孝名，所以他在登極詔書中強調「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睦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我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稍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的妥協政策。等到他做皇帝滿了三年之後，帝位穩如磐石了，各方面的佈置都已妥善了，他的猙獰面貌就開始顯露了。

當世宗整肅政策的紅燈亮起時，他首先懲處的是他自己最親信的鷹犬們。三年初，解除了隆科多的兵柄；然後罪降隆科多往寧夏阿蘭善山等處修理城池，開墾土地。十二月時，以九十一款大罪詔賜接替胤禛撫遠大將軍職任的年羹堯自盡。這些事情看上去使人眩惑，因此很多人不能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其實，這時的世宗早已掌握了全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他已經不再需要這些鷹犬了，而他們又所知者太多，還留着他們做什麼呢？

雍正四年一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時間已經過了，世宗對於手足的血腥懲處，就像狂風暴雨一樣的來臨了。首當其衝的自然皇八弟胤禩和皇九弟胤禟，雖然「聖祖實錄」經過了刪削和竄改，我們已經無法從中窺得聖祖晚年政爭的詳細情況，可是從世宗對他們兩人憤恨的程度，仍可測知他們必是世宗在聖祖晚年皇儲爭奪中的生死冤家。從四年正月起，「世宗實錄」中載錄的世宗對胤禩、胤禟的罪責，幾乎無日無之。四月時將他們勒令除宗，廢為庶人，命胤禩改名為阿其那，胤

② 世宗實錄卷七，頁二十，載雍正元年五月「庚子（二十二日），仁壽皇太后不豫。」而第二日清晨「辛丑，丑刻，仁壽皇太后崩於永和宮。」未提及任何病因及病情。

③ 見世宗實錄卷七、頁二十三。

禔更名爲塞思黑，最後在八月和九月時，終於將胤禔和胤禩斃於監所。我們從以前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出的「文獻叢編」中「允禩、允禔案」資料，可以看到胤禔在保定被折磨致死時的淒慘，其情況真是不忍卒睹的。<sup>④</sup>至於胤禩致死的情形，現在尚無資料可尋，相信世宗對他的迫害，比胤禔必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在這年的六月初三日，秉承世宗意旨的諸王，大臣們，合疏臚列胤禩罪狀四十款，胤禔罪狀二十八款，胤禛罪狀十四款。疏後並云「伏乞皇上大施乾斷，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等，卽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炯戒。」<sup>⑤</sup>自此一疏奏中所劾「允禩」罪狀，我們也可略知胤禛的一些情況。這十四款罪狀是：

第一款，「允禩性質狂悖，與阿其那尤相親密。聖祖仁皇帝於二阿哥<sup>⑥</sup>之案，將阿其那鞫問時，召入衆阿哥，諭以阿其那謀奪東宮之罪，現交議政院審。允禩與塞思黑，同向聖祖仁皇帝之前，允禩奏云，阿其那並無此心。若將阿其那問罪，我等願與同罪。聖祖仁皇帝震怒，拔佩刀欲殺允禩，經允禔<sup>⑦</sup>力勸稍解，將允禩重加責懲，與塞思黑一併逐出。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二款：「康熙四十八年夏，聖祖仁皇帝避暑口外，恐伊等聚黨生事，止令阿其那跟隨行走。允禩敝帽故衣，坐小車，裝作販賣之人，私送出口，日則潛踪而隨，夜則至阿其那帳房歇宿。密語通宵。踪跡詭異。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三款：「聖祖仁皇帝知允禩昏愚狂妄，必生事端。因遣往軍前，使不得朋匪爲惡。而允禩與阿其那、塞思黑密信往來，曾無間斷，機計莫測。衆所共知者一也」。

- ④ 文獻叢編第一輯「允禩允禔案」所收直隸總督李紱（從「硃批諭旨」上，我們知道雍正三年他爲廣西巡撫時，世宗曾密諭他在地方上搜求毒藥進呈。）雍正四年「奏報塞思黑暈死復甦摺」中，說胤禔於是夏自西寧解至保定後，「現在給與塞思黑飲食，與牢獄重囚，絲毫無異。鐵索在身，手足拘攣。房小牆高，暑氣酷烈。昨已報中熱暈死。因伊家人用冷水噴灑，踰時始甦，大約難以久存，蓋不善所致，卽有皇恩亦難逃於天殛也。」又在「奏報塞思黑病篤摺」中說及胤禔死前情況，「七月十五日忽患泄瀉……至八月初九日以後飲食所進甚少，形容亦日漸衰瘦。至二十二日……從旁窺聽，覺其語言恍惚。至二十五日早上聲息愈微，呼亦不應。至晚更覺危篤。……臣親入室內查看明白……塞思黑業已昏迷不知，不能轉動，目暗語謔，惟鼻息有氣，兩手動搖，喉吻間有痰響而已。似此危篤，難以久延。」下面一摺，卽說「塞思黑於本月二十七日卯時已經身故」了。
- ⑤ 胤禩、胤禔、胤禛三人罪款，見世宗實錄卷四十五，頁七至頁三十。世宗於疏後批諭有「朕受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實痛於衷，不忍於情。然使姑息養姦，優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於國家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爲列祖，皇考之大罪臣矣。」殺機畢露了。
- ⑥ 廢太子胤禔爲皇二子，故亦稱二阿哥。此處卽指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詔廢皇太子胤禔案。
- ⑦ 胤禔爲皇五子。他與皇九子胤禛爲同母兄弟（宜妃所出）。康熙四十八年封恆親王。

第四款：「在西邊時，取青海臺吉等女子，日夜縱酒淫亂，不卹軍政。修造房屋、勞民費帑。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五款：「指稱雜項名色，糜費國帑三四十萬，而進兵止到穆魯烏蘇，將所運糧餉遲誤。身未到藏，乃於無用之處，傷損官兵千餘，馬駝死者數千。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六款：「私受哲爾金銀六萬六千兩，將疲瘦馬匹，留與白訥喂養。令其買辦駝隻，信用藍翎鐵柱，任其招搖撞騙。向噶什圖等索銀十二萬兩，又懼鐵柱舉發，始終庇護。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七款：「在西寧時，張瞎子爲之算命，詭稱此命定有九五之尊。允禩大喜稱善，賞銀二十兩。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八款：「將到京師，一切禮儀，並不奏請皇上指示。及到京後，不請皇太后安，亦不請皇上安，大虧臣子之義。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九款：「叩謁梓宮，並不哀痛。至皇上向伊哭泣相見，伊並不向前抱膝痛哭。拉錫微加扶携，令請上安，反肆咆哮，奏稱拉錫侮慢我，求連我交與宗人府等語。皇上降旨開諭，伊愈加忿怒，退出將拉錫痛罵。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十款：「孝恭仁皇后上賓，皇上仰體慈恩，將允禩晉封郡王。並無感恩之意，反有忿怒之色。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十一款：「皇上謁陵回蹕，遣拉錫等降旨訓誡，允禩並不下跪，反使氣抗奏。良久，阿其那見衆人共議允禩之非，乃向允禩云，汝應下跪，便寂然無聲而跪。不遵皇上諭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結黨背君，公然無忌。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十二款：「允禩之妻病故，皇上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怨望非理。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十三款：「不以禮葬其妻，乃於居室之後，幽僻之處，私造兩金塔，一爲伊妻葬地，一備己身葬地。不遵國制，反從番僧之教，悖理不經。衆所共知者一也」。

第十四款：「姦民蔡懷璽，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允禩爲皇帝，塞思黑之母爲太后，用黃紙書寫，隔牆拋入允禩院內。允禩不卽奏聞，私自裁去二行，交與把總，送至總兵衙門，令其酌量完結。及欽差審問，始理屈詞窮，悖亂之心顯然。衆所共知者一也」。

除了上引「世宗實錄」中的材料之外，雍正七年（1729年）頒布的「大義覺迷錄」

上，也有很多地方說到了胤禛。「大義覺迷錄」是出自世宗御筆的一部不同等閑的書籍，我在「從『胤禛』問題看清世宗奪位」一文中即曾提及，二百餘年來由於後來的人對當時環境的失去瞭解，說者每以為此書是世宗為了滿洲人入主中原的正當而辯護的。其實這都是沒有仔細體味這部書的人，對「大義覺迷錄」的主要目的做了輕重倒置的論斷。愛新覺羅王朝統治中國到雍正時已近一個世紀了，初期所有帶有種族性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早都先後弭平了，世宗怎麼會在這樣的時候來反覆斥論夷夏之防呢？事實的情形是：當時很多知道真情的人仍然在世，而一般民間對世宗篡奪皇位的諸般情況大量的流傳着。在往昔帝王的時代，「皇位得來不正」是一個身為帝王的人最大的忌諱。世宗一直被這種暴露了真情的流言所苦惱，<sup>⑧</sup>所以當曾靜、張熙的案子一發生，世宗遂利用這一大獄為主題，以論斥種族偏見為外衣，而實質上卻對他的篡奪皇位做了一次徹底的狡辯，企圖以宣傳來掩蓋事實。我們試翻開來「大義覺迷錄」，從裏面最關重要的章節無一不是世宗為了得位而辯護的一點，就可了然了。而且我們也可相信，這部書的某些部分，或許尚有文學侍從之臣的代筆與潤色，但其中事涉宮廷鬭爭的秘密之透露，以及對弟兄們責罵時筆下的沉重語句，除去世宗自己操觚之外，絕不是任何文學侍從之臣敢於代筆的。

在這部世宗親筆的著作中，仍重複的罪責胤禛「狂悖糊塗」，說他「賦性狂愚，與阿其那尤相親密，聽其指使」，說他「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亂啓釁。後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効力以疎遠之。伊在軍前，貪婪淫縱，惡蹟種種。及朕即位降旨將伊喚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禮犯分，朕悉皆曲宥」，說他「貪贓犯法，橫取不義之財」，說他「素性嗜酒，時與阿其那沉湎輕生」，說他「漁色宣淫，不知檢束。以領兵之重任，尚娶青海臺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蕩。軍前之人，誰不知之」。<sup>⑨</sup>而在「大義覺迷錄」卷三，當提到「傳說……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禩調回囚禁。太后要見允禩，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上撞死……」之後，世宗手諭裏，遂有一長段說「夫允禩平日素為聖祖皇考所輕賤，從未有一嘉予之語，曾有向太后閒論之旨，汝之小兒子即與汝之大兒子當護衛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宮內人所共知者。聖祖皇考之鄙賤允禩也如此，而逆黨乃云聖祖欲傳大位於允禩。獨不思皇考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里外之理？雖天

⑧ 大義覺迷錄卷二、頁五十八，載世宗問訊曾靜口供，有「你自雍正元年以來，訛傳逆黨之言，是朕之失德備聞於耳。而阿其那賢孝之名，及聖祖欲傳位於允禩之事，亦入於耳」的話。

⑨ 前引諸條均見大義覺迷錄卷一，頁二十三至三十八。

下至愚之人，亦知必無是事矣。祇因西陲用兵，聖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虛名坐鎮，知允禩在京毫無用處，況秉性愚悍，素不安靜，實借此驅遠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鍾愛，器重在諸兄弟之上，宮中何人不知。及至傳位於朕之遺詔，乃諸兄弟面承於御榻之前者，是以諸兄弟皆俯首臣伏於朕前而不敢有異議。今乃云皇考欲傳位於允禩，隆科多更改遺詔傳位於朕，是尊允禩而辱朕躬，並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誅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禩來京者，彼時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禩不得在京，何以無福至此，應降旨宣召，俾得來京以盡子臣之心。此實朕之本意，並非防範疑忌而召之來也。以允禩之庸劣狂愚，無才無識。威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感人，而陝西地方復有總督年羹堯等在彼彈壓，允禩所統者不過兵丁數千人耳，又悉皆滿洲世受國恩之輩，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師，豈肯聽允禩之指使而從爲背逆之舉乎。其以朕爲防範允禩召之來京者，皆奸黨高增允禩聲價之論也。允禩將到京之時，先行文禮部，詢問見朕儀注，舉朝無不駭異。及到京見朕，其舉動乖張，詞氣傲慢，狂悖之狀，不可殫述，朕皆隱忍寬容之。朕曾奏請皇太后召見允禩，太后諭云，我只知皇帝是我親子，允禩不過與衆阿哥一般耳，未有與我分外更親處也。不允。朕又請可令允禩同諸兄弟入見否？太后方俞允。諸兄弟同允禩進見時，皇太后並未向允禩分外一語也。此現在諸王阿哥所共知者。後允禩於朕前肆其咆哮，種種不法，太后聞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責允禩，嚴加訓誨之。此亦宮中人所共知者。允禩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駕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見允禩而不得，是何論也。……即允禩之命往守陵，亦奏聞太后，欣喜嘉許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懷璽投書允禩院中，勸其謀逆之事，朕始將允禩召回京師拘禁之。是允禩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後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禩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錯至此極耶！」<sup>⑩</sup>

綜合這些處「世宗實錄」、「大義覺迷錄」中提及的胤禛，他給予人的印象，最重要的應該有下列幾點：

- 甲、胤禛是個秉性「昏愚狂妄」、「貪婪淫縱」的人。
- 乙、胤禛是個「威不足以服衆，德不足以感人」的庸劣之才。
- 丙、胤禛「平日素爲聖祖皇考所輕賤，從未有一嘉予之語」，在衆多皇子中，向不爲康熙帝所鍾愛。
- 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得派爲撫遠大將軍，開府西寧，不過是聖祖「欲以皇子虛名坐鎮」，「實借此以驅遠之意也」。

<sup>⑩</sup> 見大義覺迷錄卷三、頁三十三至頁四十。

戊、康熙帝並無立胤禛爲皇儲之意。聖祖「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里外之理？雖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無是事」。

## 貳、「聖祖實錄」上的胤禛

可是，上節引述是真的嗎？這些會不會是出於世宗歪曲的侮蔑和中傷的謊言呢？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聖祖實錄」裏面值得注意的胤禛材料。雖然「聖祖實錄」成於雍正九年，曾經世宗的諸般竄改，特別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以後，更有大量刪削的痕跡，以致康熙晚年的「聖祖實錄」很顯著的極爲簡陋。儘管如此，我們從字裏行間，仍可看出胤禛在諸皇子中的突出地位和不比尋常的地方。

一、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聖祖於駐蹕熱河時，在傷痛中詔廢皇太子胤禛並囚禁之。<sup>①</sup>十六日回京，是月「聖祖實錄」載，「戊戌（二十五日），上諭諸皇子曰，拘禁允禛時，允禩<sup>②</sup>奏，允禛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禩，後必大貴。<sup>③</sup>今欲誅允禛，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朕思允禩爲人兇頑愚昧，不知義理，倘果同允禩聚集黨羽，殺害允禛，其時但知逞其兇惡，豈暇計及於朕躬有碍否耶？似此不諳君臣大義，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爲亂臣賊子。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也。」<sup>④</sup>同月「聖祖實錄」又載，「壬寅（二十九日），上召諸皇子入乾清宮。諭曰，當廢允禛之時，朕已有旨，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爲皇太子者，卽國之賊。法所不容。廢皇太子後，允禩曾奏稱允禩好。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大寶豈人可妄行窺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所深知。其黨羽早相要結，謀害允禛。今其事皆已敗露。著將允禩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皇九子允禔，語皇十四子允禵云，爾我此時不言何待？允禵奏云，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誅允禵。皇五子允禩，跪抱勸止，諸皇子叩首懇求。上怒少解。命諸皇子撻允禵，將允禔、允禵逐出。」<sup>⑤</sup>

① 胤禛爲聖祖唯一嫡子（孝誠皇后所出），幼蒙鍾愛，康熙十四年（1675年）胤禛兩歲時，被立爲皇太子。聖祖實錄載，下詔廢太子時「上垂涕諭之……諭畢，上復痛哭仆地。諸大臣扶起。」其後諭旨中並有「自有廢太子一事，朕無日不流涕」之言。聖祖傷痛之情，概可想見。

② 胤禩爲聖祖長子（惠妃所出），年長於皇太子胤禛兩歲。康熙三十七年時封直郡王。

③ 張明德爲康熙中京師名相士，聲動公卿。據聖祖實錄載，彼相胤禩時曾言「丰神清逸，仁誼敦厚，福壽綿長，誠貴相也」。

④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四，頁二十至頁二十一。

⑤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四，頁二十三至頁二十四。

自這段記載可知，聖祖震怒要鎖拿胤禩時，皇九子胤禔思欲援救胤禩，自己不挺身而出單獨向父皇懇請求情，也未煩其他皇子向康熙帝求情，卻「語皇十四子允禩云，爾我此時不言何待？」煩請胤禔出面向父皇懇求。從情理上來推測，足見他知道胤禔在父皇之前最有份量，講話最能入耳，而他的懇求容易為父皇接納，所以才鼓動他出面的。若胤禔不為聖祖所鍾愛，在衆多皇子中是「平日素為聖祖所輕賤，從未有一嘉子之語」的人，何敢於父皇盛怒之下，犯顏力保？

二、胤禔為父皇愛重，在諸皇子中有不比尋常的地位，從下面的事情，也可以得到證明：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聖祖實錄」上載有聖祖罪責大阿哥胤禔「素行不端，氣質暴戾」<sup>①⑥</sup>的嚴旨，第二天，十一月初一日，聖祖對胤禔爵位及財產的處分，曾有詳細的吩咐。「聖祖實錄」載「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允禔著革去王爵。即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旗所分佐領，可盡撤回，給與允禩。將鑲藍旗所分佐領，給與弘王。<sup>①⑦</sup>其包衣佐領，及渾託和人口均分。一半給與允禩，一半給與弘王。」<sup>①⑧</sup>

胤禔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已得封直郡王，他與皇三子胤祉是聖祖諸子中晉封王爵最早的兩個人（胤祉封誠郡王）。前此於康熙二十九年時（1690年），準噶爾部崛起中亞，聖祖特派皇兄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遠征噶爾丹汗。是役並以胤禔為副手，其時胤禔年僅十八歲。所以在康熙四十七年以前，除皇太子胤礽外，胤禔必是諸皇子中實力最強，屬下佐領最多的一個。如今胤禔得罪，所分內務府三旗之佐領，全部撤回，並不繳還內務府，而轉賜給胤禔，且將胤禔早有的奴僕佐領及渾託和人口的半數，也一併轉賜給胤禔。試思，聖祖為什麼不把藉沒胤禔的財富和佐領賞給別的皇子，卻單單的賞賜給胤禔呢？此事所涉，或非極關重要，但不難由之見微知著，胤禔在四十七年時聖祖心目中已有何等地位，也就可以測知了。既有這樣的事情，說胤禔「素為聖祖所輕賤」，其誰能信？

三、對於胤禔來說，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封為撫遠大將軍，總理西征軍務，討伐策妄阿拉布坦的事。

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早於十八年前因途窮末路、仰藥自殺的噶爾丹汗，他的姪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崛起南疆。四月初，警報至都，康熙帝一方面即遣

<sup>①⑥</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五，頁十四至頁十五。

<sup>①⑦</sup> 聖祖實錄中此段兩見「弘王」，事實上筆者以為乃「弘玉」之誤書。按弘王玉牒作「弘昱」，朝鮮史料中作「紅玉」，乃胤禔之長子。後亦以罪囚，死於康熙五十七年。

<sup>①⑧</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五，頁十五。



右衛將軍費揚固、西安將軍席柱，督師備戰，一方面派散秩大臣祁里德，吏部尚書富寧安馳赴前方，贊襄軍務。本年八月，康熙帝認為嚴冬將至，年內不致進兵，「聖祖實錄」載，「己卯（十六日）……得旨，費揚固着帶右衛將軍印，徐還右衛。今年既不進兵，將右衛等處兵交與散秩大臣祁里德，喀喇沁塔布囊額駙格勒爾。齊齊哈爾副都統白濟，右衛副都統齊格，公同管理。著都統穆賽、馳驛前往，總理軍務。俟進兵時，另派大將軍，給與印信。」<sup>19</sup>那時是清代兵力鼎盛的時代，聖祖又為不世出的雄主。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聖祖實錄」上既然有這樣的記載，足見在策妄阿拉布坦入寇之初，康熙帝胸中早有要根除此患的藍圖了。不過他已年逾六旬，加以廢太子後，諸皇子間勾心鬭角，劍拔弩張的情勢，使他疲於應付；環境、健康、和精力，都不允許他再做御駕親征之舉，可是他要派遣一員上將，佩「大將軍」印信，代他坐鎮青海，總理西征軍務，已非秘而不宣的圖謀，而是公開的決策了。

「俟進兵時，另派大將軍，給與印信」的決定，既在康熙五十四年見諸實錄，自可想見當時朝野必均引領而望，特別是在皇二子胤禛雖於康熙四十八年復立為皇太子，而於五十一年再以罪廢<sup>20</sup>之後，儲位久懸，眾皇子們自然都希冀這一重要職任能夠落在自己的頭上。聖祖前此除親征噶爾丹時，曾令皇太子胤禛居守京師外，從未令任何皇子獨負方面之任。若是此次大將軍職任不選自皇子則已，若由皇子之中選出任命，既是前所未有的殊榮，也可測出此人簡在帝心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帝年高邁，儲位有待的皇室，它具有不平常的意義是極其明顯的。

不過派出大將軍的諭旨，雖在五十四年秋天已經透露了，大家也都在屏息以待，要看一看康熙帝派出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可是，此後一年、兩年、三年的時間過去了，大將軍卻並未能派出。聖祖晚年自廢太子後，對於諸子的謀為皇儲，以及朝中重臣的擁附邀榮的舉動，最為敏感。他不可能不顧慮到，若大將軍是由皇子之中某人充任時，將給予當時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有多大，同時，也不可能不使他的臣民聯想到這是白髮高齡的皇帝已安排好了皇儲的暗示；筆者認為這就是康熙帝反

<sup>19</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六十五，頁五。

<sup>20</sup>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帝命將太子胤禛重行禁錮，十月初一，詔再廢之。諭旨中指胤禛「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久隱忍、不即發露者，因向日有望其悔改之言耳。今觀其行事，即每日教訓，斷非能改者。……如此狂易成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乎？」又諭云，「自釋放皇太子以來，數年之間，朕之心思用盡，容顏清減。……嗣後衆等，各當絕念，傾心向主，共享太平。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聖祖對胤禛之絕望，以及無復再立胤禛為皇儲之心意已決矣。

覆考量，權衡再三、默察許久、遷延數載，遲遲沒有派出大將軍的原因。

但謎底終於還是揭曉了。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被世宗刪竄的「聖祖實錄」上有這樣簡短的一條記載：「丙辰（十二日），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禩，<sup>②</sup>為撫遠大將軍。」<sup>③</sup>

### 叁、大將軍的派出與皇儲之關係

從前引「聖祖實錄」中一些關係胤禛的材料來看胤禛，和「世宗實錄」、「大義覺迷錄」中已經有很大的差別。可是還不能看出五十七年胤禛被派為撫遠大將軍，這一事件和聖祖簡在帝心的皇儲有什麼必然的關聯。聖祖之世，雖然康熙三十六年以後至胤禛派出之前，已有二十年未曾授命大將軍職任的人，但前此於三藩之亂及遠征噶爾丹時，奉命佩帶大將軍印信的人所在多有。究竟胤禛這次被派出為撫遠大將軍，與以前派出的大將軍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它的特殊的重要性何在呢？我們從「聖祖實錄」以及其他的重要史料中來比較參閱，就可以看出撫遠大將軍的派出與皇儲問題的關係，也可以看出聖祖晚年對皇位繼承人安排的意向了。

#### (一) 諸皇子對大將軍職位的謀求

自「聖祖實錄」中明書的和隱晦的記述裏，我們至少可以知道皇子中有兩人曾經謀求過大將軍的職位：「聖祖實錄」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載，「宗人府題，臣等遵旨，確審輔國公阿布蘭，首告正紅旗滿洲都統、公、普奇，縱徇醫生賀孟頰，以礬水寫字，通信二阿哥一案。賀孟頰因醫治二阿哥福金病，二阿哥令伊將要緊事密送信息，遂用礬水寫字，往來通信。又囑託普奇保舉二阿哥為大將軍。又稱從前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曾言二阿哥災星未脫，因復探聽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來京之信。又妄稱皇上有褒獎二阿哥之旨。各處探聽、冀有釋放信息。」<sup>④</sup>按鎮國公

<sup>①</sup> 在明清史料丁編中「給撫遠大將軍、王、胤禛勅書稿」的原文是「皇帝勅諭王、胤禛……特命爾為撫遠大將軍」，而世宗實錄中在雍正元年初時的卷一和卷四裏，也有數處仍然存留着「大將軍、王、允禩」的字樣，可知康熙四十八年十月被封為固山貝子的胤禛，他在五十七年拜命撫遠大將軍之前，已經晉封王爵了。不然的話，何以明清史料的原勅書稿中不書「皇帝勅諭固山貝子胤禛」、而世宗實錄中不書「大將軍、固山貝子允禩」呢？足證胤禛在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禛封王後不久，其他弟兄們尚未封王時，他已晉封王爵。當然胤禛這種深得父皇青睞的事，也是世宗不願後代人知道的，所以一律自實錄中把它刪除了，因此，胤禛究竟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七年這十年間何時晉爵王封，我們已無法知道了。不過這却又是胤禛為聖祖器重、鍾愛的證據之一。

<sup>②</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一、頁十六。

<sup>③</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六十六，頁五。

普奇與阿布蘭為堂兄弟，均為安平貝勒杜度的曾孫。普奇這時正身兼正紅旗及正白旗兩旗的滿洲都統。<sup>②④</sup>在咸安宮被禁失去自由的廢太子胤禛，深知此次大將軍職任之重要，又知普奇是聖祖身邊的紅人，故囑託他在父皇前保舉為大將軍，求東山之再起。這就是當時曾聳動一時的廢太子礬水密書謀為大將軍案。其結果則是，鎮國公普奇被「拘禁」，醫生賀孟頰「斬監候」。

就在這一事件之前的幾個月，康熙五十四年四月末，聖祖奉皇太后避暑塞外，並命三數皇子隨駕。四月三十日儀駕駐蹕遙亭，這一天的「聖祖實錄」上，載有「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入見。上籌及西邊用兵之計，皇四子和碩雍親王奏曰，當日天兵誅殛噶爾丹時，即應將策妄阿拉布坦一同剿滅。因伊畏罪懾服，備極恭順，是以特賜生全。今乃漸漸狂悖，居心險詐，背負聖恩，種種不恭。至於侵擾我哈密干犯王章，於國法難以寬貸。自當用兵撲滅，以彰天討。上深然之。」<sup>②⑤</sup>雍親王胤禛（？）這麼早就向父皇提出對策妄阿拉布坦「用兵撲滅，以彰天討」的原則，而他又知父皇老弱，親征為勢所不許，那麼他的意向又是什麼呢？實錄的文字雖較隱晦，但仍可看出皇四子雍親王對大將軍一職思欲染指的興趣。不過，「上」僅「深然之」而已，老練的康熙帝並不說明自己心中對人選的決定。

### (二)大將軍辭闕赴軍儀注的隆重

清代在皇十四子胤禛以前以後宗室王，公佩帶大將軍印信出征的人，雖然有相當隆重的禮儀，但實錄中也不過記載於出征前皇帝有祭堂子之禮，或回軍時有郊迎及抱見禮等。可是這次胤禛以撫遠大將軍名義出征時，儀注的隆重，是有清一代空前絕後的。現存的「聖祖實錄」中，仍有多處流露出當年康熙帝對胤禛受命為撫遠大將軍時的特殊榮寵。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胤禛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後，本月「聖祖實錄」記有，「庚午（二十六日），諭議政大臣等，十四阿哥，既授為大將軍，領兵前去。其纛用正黃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樣。簡親王<sup>②⑥</sup>之子永謙，令其帶伊父之纛前往。將上三旗侍衛、派出三十員。莊親王<sup>②⑦</sup>之護衛，既於一切之處，俱不行走，如其護衛並親軍中，有情願告往效力者，爾等親加揀選奏聞。弘昉<sup>②⑧</sup>屬下之人，亦著照此。凡有

<sup>②④</sup> 見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零八「八旗大臣年表」。「八旗大臣年表」中普奇作「普琦」。

<sup>②⑤</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六十三，頁十八至十九。

<sup>②⑥</sup> 按此地簡親王即指鄭親王濟爾哈朗曾孫簡親王雅爾江阿。

<sup>②⑦</sup> 按此地莊親王即指康熙帝堂兄博果鐸而言。博果鐸為康熙帝伯父承澤裕親王碩塞之子。

<sup>②⑧</sup> 弘昉為弘昱之弟，皇長子直郡王胤禛的次子。五十七年初弘昱身故，此時他正繼承其父獲罪後所轄之各佐領。

子弟出兵之王等外，其不出兵之王等，亦令各選護衛三員。貝勒、貝子、各二員，公等各一員。隨十四阿哥前往效力。步軍協領愛哈那，行走熟諳，令其統轄王等之護衛前去。尋將王等護衛、散騎郎、典儀共三十六員，親軍校四員、親軍二十六名，開列具奏，報聞。」<sup>⑳</sup>

十一月「聖祖實錄」中記載，「己丑（十五日），上以進剿策妄阿喇布坦大兵起程。御太和殿，排設鹵簿前進。其出征之王等以下，俱戎服。其不出征之王、貝勒等以下，俱蟒服以從。上親詣堂子行禮。次鳴角。祭旗纛。禮畢。回宮」<sup>㉑</sup>

十二月十二日胤禛辭帝離京。這一天「聖祖實錄」載「撫遠大將軍允禩，率兵起程。上命內閣大臣，頒給大將軍敕印於太和殿。其出征之王、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齊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貝勒、貝子、公，並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齊集午門外。大將軍允禩，上殿。跪受敕印，謝恩、行禮畢。隨敕印，出午門，乘騎出天安門。由德勝門前往。<sup>㉒</sup> 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並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處。大將軍允禩，望闕叩首行禮。肅隊而行。」<sup>㉓</sup>

試看這一切舉措和儀注，是何等隆重、何種氣象？而雍正三年六月初八日「世宗實錄」上載有世宗責罵胤禛的話說「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禩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sup>㉔</sup>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不過也使我們想到，聖祖如此的榮寵胤禛，其意何為呢？

### （三）大將軍的職權

「聖祖實錄」中幾乎很難看到聖祖降給撫遠大將軍「允禩」的諭旨，所以不易看出大將軍的職權。不過因軍務關係，胤禛於五十七年疏參副都統祖維新，五十八年疏參吏部侍郎色爾圖，都統胡錫圖，五十九年調隨軍出征裕親王保泰子廣善回京，調簡親王雅爾江阿子永謙回京，調固山貝子魯賓回京，聖祖都以「應如所奏」從之。而五十八年四月「聖祖實錄」中稱「查都統延信等，既稱大兵不必出口。應令在西寧駐札。至於作何料理駐札，以及留兵若干，所留官兵馬匹，於何處牧放等

⑳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一，頁二十二至二十三。

㉑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二，頁四。

㉒ 北京故事：大兵出發時，軍出德勝門；入陣時進安定門。而北京各城門除德勝門外，甕城女牆、箭樓，建築形式相同，德勝門則巍峩壯麗甚於他門。想當日建門時即寓鼓舞軍心、早慶凱旋意也。

㉓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二，頁十至十一。

㉔ 見世宗實錄卷三十三，頁十。

事，俱令大將軍酌量而行。」<sup>④</sup>同月並有「朕曾有旨，此次大兵在外，如遇章京，並護軍校，驍騎校缺出，令大將軍即行補授」之言。<sup>⑤</sup>

王鍾翰氏所著「胤禛西征紀實」一文，主要引用的是鈔本「撫遠大將軍奏議」中的材料。其中五十八年聖祖頒給隨征蒙古、青海王公、臺吉等，有這樣的諭旨：「現在大將軍、王，帶領大兵，駐守西寧，由此〔北京〕降旨，相隔甚遠。軍事當相機調遣……大將軍、王，是我皇子，確係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故令掌生殺重任。爾等〔青海盟長、親王羅布藏丹津等〕或軍務，或巨細事務，均應謹遵大將軍、王指示。如能誠意奮勉，即與我當面訓示無異。」<sup>⑥</sup>

從這些片斷的章句中，仍可看出聖祖對十四子胤禛非但予方面之寄，且畀任專重，甚至向青海、蒙古臺吉等說「大將軍、王，是我皇子，確係良將。……爾等巨細事務，應均謹遵大將軍、王指示。如能誠意奮勉，即與我當面訓示無異。」如果我們把這些情況與世宗所說「西陲用兵，聖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虛名坐鎮，知允禩在京毫無用處，況秉性愚悍，素不安靜，實借此驅遠之意也」的話，兩相比較對照，應該是南轅北轍吧。

#### （四）聖祖晚年引為戒懼的事

聖祖晚年，自廢皇太子後，在衆多皇子中再立儲位之事，最使他躊躇難決，精神耗損。加以諸大臣構陷其間，希邀異日之榮寵，尤其令這位年近古稀的皇帝窮於應付，心力交疲。他在這段時期，幾乎所下的重要諭旨，都和此一焦心苦思的問題有關。例如康熙五十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病中召集諸皇子、滿漢大學士、文武大臣、九卿等於乾清宮東暖閣。在這次懇切的長諭中，關係緊要的幾段是，「……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預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

④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四，頁二。

⑤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八十四，頁六。

⑥ 據王氏說所引見鈔本撫遠大將軍奏議頁三十二。

耶。」<sup>⑦</sup>

特別使聖祖放心不下的，乃他深知幾個年長的皇子不但才具出眾，又都有爭奪帝位的野心。平日門戶之見已成，相互黨同伐異。一旦變生，他日之禍起蕭牆，為最使他戒懼的事。故此，他曾屢誠諸皇子說「衆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後臨終時，必有將朕身置乾清宮，而爾等執刃爭奪之事也！」像這樣沉痛的話，在聖祖晚年的實錄中，前後也可以兩三見。<sup>⑧</sup>

就這些諭旨來看，聖祖既自知已到了「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朝不保夕的殘年，又瞭解到「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的流弊；並對儲位的授受，假手他人，「深為恥之」，更且說明「立儲大事，朕豈忘耶」。足見聖祖對儲位的問題已經妥為安排了。已經在他「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的遺詔中，交待得清楚了。這些地方，固可以明示出世宗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向總理事務王、大臣及九卿等所說「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即聖祖殞天日），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的顯然的破綻。況且他還欲蓋彌彰的接上一句「薄海內外，莫不傾心悅服。」<sup>⑨</sup>適足證明當時諸兄弟和衆宗室王公、貴戚等，對這位篡奪皇位者的側目而視和心不悅服。而最主要的一點，是聖祖深懼重蹈齊桓公臨終時的覆轍，諸子兵戈相向、東甲互爭之事也發生在自己身上。致使他的一世英名，付之流水。那麼五十七年聖祖授命胤禛為撫遠大將軍，畀以方面之寄；並使他一手掌握天下精兵。設若聖祖無意立他為皇儲，而在遺詔中另立他子為皇儲，這樣，豈不是促使自己死後諸皇子「執刃爭奪」的形勢和機會，其可能性為之加強嗎？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聖祖拙笨到作繭自縛、自相矛盾的去製造糾紛。甚至我們相信：聖祖之增高皇十四子的聲望，又讓他控制着兵權，另外的皇子根本沒有與他兵戈相抗的能力和地位。是一種辦之既早，又可避免異日臨終時「將朕身置乾清宮，而爾等執刃爭奪之事」發生的辦法。這實在是聖祖焦心苦思後想出同時解決他雙重顧慮的聰明辦法。

#### (五)「世宗實錄」中的一項重要提示

翻開「世宗實錄」，首卷第三頁上就有「聖祖嘗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蓋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

<sup>⑦</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七十五，頁十至十二。

<sup>⑧</sup>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五、頁九。及卷二百六十一，頁九等。

<sup>⑨</sup> 見世宗實錄卷十，頁十六。是日亦即世宗宣布密建儲位制之日也。

那意思是說，世宗之繼承帝位，很早以來即簡在父皇聖心了。類似的話在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向諸大臣宣佈密建儲位制之日，又重覆說「皇考當日，亦曾降旨於爾諸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斷不致貽累於爾諸臣也。」<sup>④</sup>

自「世宗實錄」上這項記載，使我們相信聖祖這幾句有關皇儲問題的重要談話，不但是他晚年一再向諸王、大臣說過的，並且曾見諸詔旨，為衆大臣所熟知的。他既是有這樣重要的談話，我們自然也有興趣去查看聖祖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情形下講的這種話？可是當我們細檢「聖祖實錄」時，不禁感到驚訝，因為我們根本找不到什麼地方對這樣重要的話有過記載，倘若不是「世宗實錄」上一再的引用，則我們就完全不知道聖祖曾有如是之言。這豈不是一件極其奇怪的事？

這件奇怪的事，值得我們深思的有兩點：一、聖祖當日說的這種話，定非暗示褒獎世宗之言，如果對世宗有「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的隱指之意，早該在「聖祖實錄」中大書特書了。如今這樣重要的言論在「聖祖實錄」中不見了，正可說明聖祖說此話時的時間、情況、和對象，指的必是其他的皇子而非世宗。就因為這種緣故，此一重要諭旨，在「聖祖實錄」中才會遭遇到了刪除的命運。

另一點，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聖祖之言指的不是世宗，那麼他指的又是誰人呢？事實上，這個答案我們從前述的幾節裏，已經可以很清楚的得到了。康熙帝於五十七年獨拔皇十四子於諸子之中，特命他為撫遠大將軍、王，總領西征軍馬。從征諸王、將軍、地方督撫，悉聽調遣。出征絕域，進兵西藏，邀擊策妄阿拉布坦。開府青海，中樞不為遙制。權任之專，宛如第二個皇帝。這樣的人，還不就是聖祖由皇子中選擇出來的「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的儲君嗎？

#### (六) 朝鮮史料中的透露

朝鮮派去北京的使節，在他們的記事或對朝鮮王的報告中，涉及大將軍胤禛的，雖然不多，但卻值得我們的重視。原因是：一、他們都是當時人的報告，在時間上不易發生錯誤。二、他們都是外國人，與諸皇子間無利害關係，純為客觀的報導。因此，無需感情用事，所述真實性和可信性更高。

像朝鮮備邊司（等於清代的軍機處），當時就有這樣的記載：「戊戌（為康熙

<sup>④</sup> 見世宗實錄卷十、頁十六。

五十七年)節使別單內：十四王及十五王之子<sup>①</sup>領兵出征。而十四王則為平西大將軍(按應為「撫遠」大將軍，朝鮮人記載中多稱平西大將軍，備邊司之稱謂隨誤。)……軍中旗纛皆用黃色。十五王之子仍用其父之旗纛。……旗纛皆給黃色者，似是佯示親征之意。一以慰湯古特之民心。一以挫西遼方張之勢云。」<sup>②</sup>

康熙六十一年，朝鮮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副使李萬選給朝鮮王的報告中，也提及「所謂十四王者，與新君同腹兄弟，而康熙愛子，且有民譽。往年拜征西大將軍往征西賊矣。上年四月自軍中入朝，則父子相對，親賜玉璽以送。」<sup>③</sup>

雍正三年，朝鮮別賚官金慶門手本中說「十四王西征時，手握餉柄，廣布恩惠。至今西土人皆香火追思之。以是(世宗對之)不無嫌逼。」<sup>④</sup>

而那個曾經率直指出「十四王本名允禛(他把皇四子和皇十四子之名倒置)，而雍正則必稱允禩，未知何以改名也」的朝鮮吏曹判書李坤，在他寫的「聞見雜記」中說「十四王……擁兵在外，屢建大功。衆心咸屬。」並說「雍正之所最忌者，十四王也。暴揚其罪狀，無所不至。」<sup>⑤</sup>

這些外國人的筆下，說胤禛是「康熙愛子，且有民譽」，他領軍出征時「旗纛皆給黃色者，似是佯示親征之意」；說他「屢建大功，衆心咸屬」，「至今西土人皆香火追思之」。特別是說，在康熙六十年冬，胤禛自甘州(按胤禛於六十年五月後移駐甘州)入朝陛見，六十一年四月再赴軍前時，「則父子相對，親賜玉璽以送」。那種涵意，除去了聖祖向朝野顯示他已選就了皇儲之外，還能做什麼解釋呢？

#### (七)聖祖的配合佈置

從正面觀察一事情，有的時候尚不如從側面觀察，所得更為清楚。我們自「八旗通志」的「八旗大臣年表」，當可看出，聖祖的確是經於世故，對政事嫺熟老練的皇帝。五十七年冬，他授命皇十四子胤禛為撫遠大將軍後，為了配合這一政策，也為了一旦變生，軍事上不致出現紕漏，他把當時控有軍權的將領們——八旗

<sup>①</sup> 皇十四子胤禛授命為撫遠大將軍出征時，以弘曙副之。弘曙為皇七子淳親王胤祐之長子。五十七年十月皇七子淳親王胤祐掌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都統。這時胤禛年三十一歲；弘曙年二十二歲。朝鮮史料中稱「十五王之子」，誤也。世宗登極，立將弘曙自西寧召回。雍正初，責以「愚昧怠惰，並無勉勵成人之意」，革去爵位及一切差使。

<sup>②</sup> 見朝鮮史料肅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備邊司謄錄第七十三冊，頁二百五十二上。

<sup>③</sup> 見朝鮮史料同文彙考補編卷四、使臣別單頁二。

<sup>④</sup> 見朝鮮史料同文彙考補編卷四、使臣別單頁三十一。

<sup>⑤</sup> 見朝鮮史料燕行錄頁六百八十二至頁六百八十五。



都統，做了一次通盤的調動。八旗都統在晚清時雖已成了僅有虛名而無實權的職位，但是在康熙時代，八旗都統，特別是八旗滿洲都統，都是軍事上最有力量的人物。「八旗都統年表」<sup>④⑥</sup>上記載，聖祖本年冬和五十八年時，更換了五位都統，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顯然的，聖祖這一措施，是爲了要使胤禛臻於金城湯池的穩固地位。

在這次的軍事調動後，依「八旗通志」「都統年表」的記載，當時正黃旗滿洲都統爲胤禩。<sup>④⑦</sup>鑲黃旗滿洲都統爲阿爾納。正白旗滿洲都統爲胤禎<sup>④⑧</sup>及滿都護。鑲白旗滿洲都統爲色欽。正紅旗滿洲都統爲圖思海。鑲紅旗滿洲都統爲蘇努。<sup>④⑨</sup>正藍旗滿洲都統爲胤祐。鑲藍旗滿洲都統爲阿布蘭。這些人中除了兩三位目前我們尚無資料可尋外，其餘的幾乎都是皇八子和皇十四子一系的人物。<sup>⑤⑩</sup>因此，自「都統年表」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雍正元年時，這些人則全部的被解除兵柄，而代之以他人了。

聖祖做了這樣的安排，再加上當時步軍統領、提督京師九門的是隆科多，他也一向是皇八子胤禩一系的人物。軍事首長全部做了如意的調配，使胤禛雖遠離京

④⑥ 見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零八，「八旗大臣年表二」。

④⑦ 胤禩爲皇十子。康熙四十八年封敦郡王。五十八年正月，聖祖命其身兼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都統。世宗即位，却罵他說「允禩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文學武藝，蒙皇考訓諭數十年，終於一無所成。平生無一事可以上慰皇考聖心。」又責爲「與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禩、結爲死黨」的人，自雍正三年削爵禁錮，數度幾瀕於死。雍正十三年世宗崩後，始獲釋放。

④⑧ 胤禎爲皇十二子。康熙四十八年封固山貝子。五十七年十月，與堂弟貝勒滿都護——恭親王常寧子，共同管理正白旗事務。世宗篡奪皇位後，他大約是向世宗輸誠者之一，因此立晉履郡王，並出掌禮、工兩部。朝鮮史料上，於雍正初，曾記有「廢太子及皇長子方在高牆內（圈禁），新君既立，遣十二王放出，則皇長子彎弓欲射，十二王急走得免。」足見胤禩對世宗及胤禎的仇恨之深。

但雍正元年末，世宗即責以「允禎自封王以來，並不感激效力」，罪降貝子，除工部事務。二年六月，再以事斥爲「器小庸劣」、「卑污不堪」，降鎮國公。解去一切職務。雖於雍正八年五月再晉履郡王，可是終世宗之世，胤禎未見信任。

④⑨ 蘇努爲安平貝勒杜度孫，世宗的從兄弟行。初襲鎮國公，康熙三十六年封固山貝子。是聖祖最親信的宗室之一。掌鑲紅旗滿洲都統二十年以上。平夙支持皇八子胤禩，一向爲世宗所痛恨。世宗篡立，晉爵蘇努爲多羅貝勒。惟不久以罪革爵，遣配右衛。雍正二年死於流所，年七十七歲。世宗仍以其「係阿其那、塞思黑黨亂助逆之罪魁，雖經身死、應照大逆律戮屍揚灰、抄沒家產，以彰國典」的人，除其宗籍，將他的子孫黜爲庶人。高宗嗣位，始又將其子孫收入宗藉。

⑤⑩ 聖祖夙知皇八子胤禩與皇十四子胤禛兄弟間友于之篤。康熙五十五年秋天，胤禩身患重病，九月十二日聖祖實錄上有這樣的記載，「上聞皇八子多羅貝勒允禩染患傷寒，降旨十四阿哥允禩，向來與八阿哥允禩相好，著伊同太醫，商酌調治。」

從聖祖實錄上看，聖祖雖似不甚喜愛胤禩，但他也深知此子才能出衆。筆者以爲，聖祖有讓皇八子胤禩扶佐皇十四子胤禛做皇帝的意向。

師，但不致有後顧之憂。所以，聖祖遣這個「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里外」的道理，乃是在於：一、讓胤禛躲離京師中弟兄們互相勾心鬭角，爭權奪利的是非圈子。二、使之獨立在外諳練嫻熟軍旅征戰及處理行政之事務，備異日能勝大任。三、完成戰功，建立胤禛的極高聲望。四、令胤禛一手握重兵於外，弟兄們無與之抗衡的力量。五、一切均安排妥善，即使猝發事故，已無變生肘腋之間的問題。

按說，聖祖的設想不能算不周密，應該是萬無一失了。誰會料及，僅僅由於隆科多的背叛，一個重要環節出了毛病，竟使整個的計劃全成泡影。難怪世宗在雍正元年一月時，硃批給年羹堯的密摺上，有「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羣拔類之希有大臣也！」的話。世宗初做皇帝，什麼人都尚沒有機會對他立「功」的時候，隆科多卻已經是他的「功臣」了；這「功」是什麼功呢？本來沒有機會做皇帝的雍親王，因隆科多之「功」而得登大寶也。世宗在硃批中躊躇滿志的心情也躍然紙上。一個人在得意忘形的時候，時常就把真情流露了。

上引的這些材料，不過在證明聖祖對皇儲的問題，並非沒有安排。而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的派出，並此一職任又落到皇十四子胤禛頭上的事，其實就是聖祖向他的臣民顯示，此即「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的人了。

## 肆、一些疑問的解決

本文以及前此的「從『胤禛』問題看清世宗奪位」，目的在求結束許多年來對清代初年的這一大疑案的爭論。雖然從前曾有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和王鍾翰「清世宗奪嫡考實」兩篇長文的發表，但於清世宗入承帝位之確否出於篡奪，仍然世論紛紜。筆者認為，研究雍正時期很多重要的問題，若對清世宗這一最主要的關節，如果認識的不夠清晰和正確，則很難瞭解清世宗的為人。對雍正時期衆多問題的研究，也就不易把握，難獲合理滿意的答案了。本文和前文的提出，在於加強孟、王二先生的論斷，用更積極的證據，宣佈清世宗的入承帝位，乃是出之篡奪。甚且，筆者相信：連清世宗的名字——胤禛，也是因利就便，在篡奪大統時假造出來的。

雖然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可是有一些疑問，仍須待解決，其中主要的，

如：

### 一、何以世宗未遭遇到胤禛的兵力反抗

胤禛既然佩撫遠大將軍印信，坐鎮西陲。手握重兵。爲甚麼他對雍親王的篡奪皇位不能起兵反抗呢？孟森在「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中，引用「大義覺迷錄」原文甚多。但他認爲世宗的話多爲一面之辭，未可相信，不過其中說到胤禛在軍前時「陝西地方復有總督年羹堯在彼彈壓，允禩所統者，不過兵丁數千人耳。又悉皆滿洲世受國恩之輩，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師，豈肯聽允禩之指使，而從爲背逆之舉乎？」對於這一點，孟文說「惟允禩在軍中爲年羹堯所彈壓，無能爲變，此則非謬。羹堯爲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內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堯，確爲實事。」這是孟心史先生據以爲胤禛不能舉兵相抗的理由。

王鍾翰在「清世宗奪嫡考實」中，對於這一問題所持的意見，和孟文相差無多。他認爲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夜世宗奪位後，「翌日之命，在內以馬齊，<sup>⑤</sup>隆科多總理事務，在外以年羹堯代理允禩西陲軍務。馬固禩黨，反覆構煽其間，賣禩求榮，任馬卽足以制禩死命；隆、年俱兵權在手，任隆、年卽足以控制反側。」王氏的另一論文「胤禛西征紀實」中也說，「揆聖祖之意，胤禛兵權在握，何事不可有爲？而不料世宗能運用一年羹堯，卽足以摧其本根。胤禛徒擁虛號，竟成束手矣。」

年羹堯或多或少的有些箝制胤禛的作用，可能不假。這也許就是雍正初年世宗對他榮寵一時的原因。可是如果說因有一年羹堯之掣肘，就使得胤禛束手無策，而年羹堯不過爲川陝總督，一川陝總督何以就能使身爲撫遠大將軍，總緝兵符的人俯首聽命？這種結論似乎都難以令人心折。所以王鍾翰在「胤禛西征紀實」一文之最後，也認爲不能自圓其說，而提出疑問說「胤禛手握兵權，坐鎮西北者四五年。乃一旦變起蕭牆，竟恬然聽命於一介之使，半生禁錮，憂憤老死於牖下。拙著『清世宗奪嫡考實』一文，於其受制於年羹堯一點，固已明白指出；唯禛大將軍也，而年一總督耳，年何以能制禛？禛何以失敗於年手？則一尙待詳加探討之問題也。」

⑤ 馬齊，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父米思翰康熙初爲戶部尚書。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馬齊任山西巡撫；三十年（1691年）升兵部尚書；三十八年（1699年）授武英殿大學士；深爲聖祖倚任。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詔廢皇太子，是年多，帝諭滿漢大臣保奏可爲儲貳之人，馬齊暗中喻衆，舉皇八子胤禩，聖祖震怒，革職拘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起爲內務府總管大臣；五十五年（1716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雍正元年（1723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晉太保。高宗立，引疾乞休。乾隆四年（1739年）卒，年八十八歲。又，其弟李榮保之女，於雍正五年（1727年）奉世宗命，册封爲皇五子弘曆之嫡妃。卽後日高宗孝賢皇后也。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任何解釋，若稍涉牽強，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多年以來，筆者即相信：這其中一定還另有甚麼更充份的理由，才足以合情合理的說明胤禛沒有任何抵抗就俯首聽命的事。

去年——一九七五年，筆者藉度假之便，在中華民國臺北中央研究院作充實自己的進修，當好友張存武先生把甚多的朝鮮材料見示時，這一項小的疑問，立刻就迎刃而解了。朝鮮全城君李滉和李萬選是康熙六十一年派去北京的冬至行正使和副使。他們因適逢其會，歸後給朝鮮王的報告，提到「十四王」的遭遇時說，「十一月（聖祖）感疾之初，密詔召之。未及到，而先崩。新君即位後，以其擁兵在外，慮或不受命，假稱康熙詔命，使之入朝而責其違限十日，不即召見，日久，然後只得往留於景山殯側。而索其前賜玉璽及密詔，則違拒不納，語且不遜。故既革王爵且有加罪之意，而有掣肘處不敢發云。」<sup>⑫</sup>看到這段記載，則一切真相都清楚了。

按「永憲錄」卷一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子（初七日），上（聖祖）由南苑復幸暢春苑。己丑（初八日），上不豫。」後面附註：「傳旨，偶冒風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靜養齋戒。一應奏章，不必啓奏。」聖祖大概深覺此次病勢非輕，遂即密詔胤禛速歸，以託付身後之事。可是詔旨自京師傳達甘州軍前，即使以「六百里加緊」遞之，也非旬日所能到。<sup>⑬</sup>當令胤禛速歸的密詔發出不久後，而京中大事已出了。「永憲錄」上續記「甲子（十三日），戌刻。上崩於暢春苑。」後面附註：「上宴駕後，內侍仍扶轎輿入大內。相傳隆科多先護皇四子雍親王回朝哭迎。身守闕下。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次日至庚子（自十四日至十九日）九門皆未啓。」試想，聖祖崩後世宗和隆科多把北京城九門緊閉，厲行戒嚴了六天。這是爲了甚麼呢？他們就是一方面要壓制京中諸王無法蠢動；一方面嚴查行人，不許京中諸王所遣通風報信的人把聖祖崩逝的消息走漏到甘州前線。等到胤禛接護密詔後，輕騎簡從的趕返到了中途，得知消息時，一切都晚了。世宗已進封輔國公延信爲固山貝子，赴軍署理大將軍事。胤禛這時，折返呢？軍隊已經脫手了，再赴軍前是不可能了。進京呢？則世宗已佈置好了一切，只在等待着「請君入

<sup>⑫</sup> 見朝鮮史料同文彙考補編，卷四，「使臣別單」頁二。

<sup>⑬</sup> 胤禛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奉命駐節甘州。入冬後，爲了計議來年大舉進剿方略，疏奏以「事關重大，請容臣輕裝赴京，恭請訓旨」。據聖祖實錄所載：「議政大臣議覆撫遠大將軍允禵」的「應如所請」覆文之發出，爲十月初九日（丙寅），而胤禛自甘州返京在南苑陛見的日期爲十一月二十六（癸丑），前後共四十七天。現聖祖殯天後撫遠大將軍胤禛返京日期於世宗實錄、雍正朝東華錄中均不載，今按永憲錄所記，胤禛抵達京師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戊辰）。自時間上看來，朝鮮史料中說「十一月感疾之初，密詔召之」，是非常正確可信的。

甕」。他的處境，已到進退失據的地步，雖諸葛復生，也只有徒呼負負了。而他於氣憤填膺之下，尚且行文禮部，仍以皇儲自居，詢問篡奪者與他相見時的儀注，不過徒增世宗的憤恨和冷笑而已。「永憲錄」上的記載，正好給朝鮮史料做了最好的註腳。

就今日來看當年之事，世宗所說「皇考春秋已高，豈有將欲傳大位之人，令其在邊遠數千里外之理？」是真的把聖祖對皇儲一事安排的弱點說中了。不然的話，那裏會使世宗有篡奪皇位的機會呢？就是隆科多思欲變節，如果胤禛在聖祖病危之前返京，則一切意外之事自均不會發生了。歷史也不會是按照後來這樣的發展了。甚至於胤禛倘若仍在軍中，篡奪者必將多所顧慮，因為會不會遭遇他的兵力反抗，尚在不可知之數。而今，時間的安排對胤禛竟「巧」得如此殘酷，讓他既離開了大軍，卻又未能在父皇宴駕前返抵京師；同時也「巧」得只須隆科多一人之力，就使雍親王易如反掌的摘得了「至尊」之果，這豈不可以歸之於冥冥中的一種「天意」的安排嗎？我們應知，那個時代尚是所謂「名器至重」的時代。儘管雍親王與隆科多狼狽為奸，竊奪了大位，可是，他既與很多人「君臣之分已定」，那也就是世宗已經先一步的掌握了天下名器。胤禛和其餘諸王遲來一步，正是「一着差，滿盤輸」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所能選擇的途徑，恐怕也只要一、向世宗臣服。二、對現狀忍受。三、起兵相抗。不過如果他們或有可能的去選擇後者的話，在那時代與中央政府的皇上為敵，就叫「造反」，這個名辭已經使他們立於「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上了。

何況，另外一項事實亦不容忽略：愛新覺羅氏建立的清代王朝，彼時正是如日之升的時候。清聖祖固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皇帝。就是他的兒子們——清世宗自不失為一代令主；而「胤」字輩其他諸王，那一個人做了皇帝，當也不會與世宗相上下的。他們在遇到關係個人利害的緊要關頭，多能識大體，保持着甚至不惜自我犧牲的冷靜。試看，雍正初皇九子胤禛經過陝西時，山陝豪強們派人與他連絡，要擁他為王，與世宗相抗。胤禛一口回絕了他們說，「我們兄弟沒有爭天下的道理。」<sup>⑤④</sup> 皇十四子胤禛更是恨世宗入骨的人，但當與他一起禁錮的兒子弘明，<sup>⑤⑤</sup> 誕

⑤④ 見文獻叢編第一輯所載「允禩允禵案」中收錄的「穆景遠口供」。並見世宗實錄卷四十五、頁二十一。

⑤⑤ 弘明為胤禛次子；小字白起。世宗實錄雍正四年五月初二日載，「前令允禩在馬蘭峪居住，原欲其瞻仰景陵，感發天良，痛改前非，洗心滌慮。而允禩並不醒悟悔改，蔽錮日深。……則馬蘭峪亦不可令其居住。著滿都護、常明、來文、馳驛前往，將允禩撤回。朕思壽皇殿乃供奉皇考、皇妣聖容之處，將允禩於附近禁錮，令其追思教育之恩。寬以歲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屬不堪，著與允禩一處禁錮。」十三年（1735年）秋，世宗去世，與胤禛同被釋放。是年十一月，高宗封弘明為多羅貝勒。

生長子時，他自己則為愛孫命名為永忠。<sup>56</sup>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窺測出他們不肯背叛愛新覺羅王朝的心情；也能看出他們具有不為愛新覺羅王朝自掘墳墓的智慧。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雖然滿洲人入主已八十年了，可是民族間的隔閡，絕非八十年的時間所能沖淡和泯除的。那些忠於明室的孤臣義士，山林隱逸，以及漢人中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人們，在遇到適當的機會時，都會一呼百應，揭竿而起的。當時若果真是胤禛起兵奪權，清室內部的統治權發生了動搖，將是漢人最高興看到的事。這種渴望等待着的良機到了，還能放過去嗎？一俟天下大亂，不僅是那一個皇子都做不成皇帝，連愛新覺羅王朝恐怕也早於入主中原八十年後就土崩瓦解了。清朝氣運方隆，聖祖的一時瑜亮之選的諸皇子們，當然不致於胡塗昏聩到這種地步吧。

可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對世宗的屈服和投降。事實上他們對篡奪皇位者始終持輕藐的，不合作的態度。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責罵胤禛說「當日（世宗即位之初）……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無所不極其至。且披肝露膽，誠切勸告，至於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懇求耳。」<sup>57</sup>世宗之得登大位，如是受之於父皇遺命，名正言順，誰敢不從？又何所顧忌？何必對胤禛「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呢？甚且說「所少者惟下跪懇求耳」。「大義覺迷錄」裏的話，是否確有其事，我們只能姑妄聽之；但它出之於世宗筆下，則不容置疑。而這種地方豈不是又暴露了他自己的弱點——篡奪者主動的望求諒解和妥協嗎？胤禛自然是不肯妥協，始終不「感激醒悟」的人。最後則繼之以死了。

胤禛呢？「大義覺迷錄」上說，「允禩拘禁已四年有餘，至今悍傲如昔。」<sup>58</sup>另如「永憲錄」是一部專事暴露清世宗過惡的書。<sup>59</sup>在此書第四卷的上卷，有一則記事說，「（雍正）八年秋，因怡親王<sup>60</sup>薨，降旨矜卹允禩，欲加委任。相傳令

<sup>56</sup> 見燕京學報第十二期，侯堦所著「覺羅詩人永忠年譜」一文。按清代皇室排字，自世宗一輩起，為胤→弘→永→綿→奕→載→溥。

<sup>57</sup> 見大義覺迷錄卷三，頁六十。

<sup>58</sup> 見大義覺迷錄卷三，頁六十一。按大義覺迷錄頒發於雍正七年（1729年），此處世宗說拘禁胤禛「已四年有餘」，全為不實之言。胤禛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1723年）由軍前返抵京師後，即失去自由。

<sup>59</sup> 永憲錄書成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自言為「蕭爽」所輯；但蕭爽之生平則不可考。書中收錄多為雍正初年邸鈔，註以聞見；對於胤禛、胤禛、年羹堯、隆科多諸獄，所記尤詳。按世宗崩後尊稱「憲」皇帝，此書名「永憲」，或寓有「永世憲皇帝之惡」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北京中華書局將鈔本永憲錄付印，書後鄧之誠先生談話有「每恨官書所記，與事實相去恒遠。使多得類比之作，史之徵信為不難矣。」對之推重如此。筆者前寫「從永憲錄來討論年羹堯的年歲」一文，發表於中華民國臺北出版的故宮季刊第十卷第一期；文中對本書曾有較為詳細的評介。

<sup>60</sup> 怡親王名胤祥，聖祖第十三子。終康熙之世，並無任何爵封；世宗篡立，翌日晉爵和碩怡親王，總理事務；為世宗之左右手。迭受世宗推許。雍正四年（1726年）為世宗薨胤禛、胤禛於監所之年，特賜胤祥「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扁額，以佳獎之。雍正八年（1730年）卒，年四十五歲。詔以怡親王爵世襲罔替。

大學士馬爾賽諭以聖意，回奏有『殺馬爾賽<sup>①</sup>方任事』語。上置之。賜居圓明園旁關帝廟。十三年，上不豫。特旨召見。先示勉勵之訓，後申寄託之意。堅以病辭。」<sup>②</sup>從這些記載，足見他也是一個說甚麼都不肯向哥哥妥協的人。

這一切，就是胤禛「聽命於一介之使，半生禁錮，憂憤老死於牖下」的真情了。

## 二、大學士王揆及十二御史疏請建儲的疑案

康熙六十年（1721年）萬壽節前（按聖祖生辰為三月十八日），又出了一件與立儲問題有關連的糾紛，那就是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揆和監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先後疏請建儲，並要求釋放廢太子胤禛一案的發生。「聖祖實錄」上記康熙帝手書諭旨，嚴譴諸人說「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揆等不悅，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舌也。」<sup>③</sup>從實錄上的文字看，好像王揆等妄行陳奏，有將興大獄之勢。但最後聖祖卻命對「諸人暫停議罪」，只發陶彝等十二人為額外章京，令赴軍前効力。王揆年老，以伊子詹事王奕清代去。為此案之結束。

這一事件，表面上似乎與胤禛無關，但若實際果如「聖祖實錄」或「清史稿」王揆傳<sup>④</sup>中的記載，在五十六年冬天皇十四子胤禛已被授命為撫遠大將軍之後，竟於六十年時仍然發生大學士王揆和十二位監察御史疏請將胤禛再立為皇太子的事，那至少表示胤禛授命為撫遠大將軍與儲位默定一事全無關連。不然不應該有這麼多的大臣，明知胤禛已是簡在帝心的皇儲，卻還要自討沒趣的倡言復立廢太子。所以六十年春大學士王揆「密疏復儲」一案的發生，的確使人感到迷惑。是不是五十六年冬日以後的胤禛，並非是朝野心目中的皇儲呢？還是王揆「密疏復儲」一案，內容有甚麼被歪曲的情形呢？

① 馬爾賽，馬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三等公圖海之孫。聖祖晚年為領侍衛內大臣。世宗立，命即代敦郡王胤祿為正黃旗滿洲都統。六年（1728）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八年（1730年），命與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詳議軍行事宜。九年（1731年），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討噶爾丹策零師敗績，授命為撫遠大將軍。師出無功。十年十二月（1733年），世宗以庸懦無能、貽誤軍機罪，斬馬爾賽於軍前。

② 見排印本永憲錄三百〇九頁。

永憲錄上的這段記載，也許可以證明傳說中世宗為民間俠隱甘鳳池、呂四娘等刺殺流言的虛誑。因該書中說到十三年（1735年）世宗「不豫」之時，似自知病或不起，故曾特旨召見胤禛，有託孤之意。而為胤禛所拒。則世宗非暴斃於宮中可知矣。

③ 見聖祖實錄卷二百九十一，頁二十五至二十七。

④ 見清史稿列傳七十三。

非常幸運的，是王揆的前後四密疏，以及陳嘉猷，陶彝等人前後兩疏，原件並未被世宗銷毀，這六篇奏摺在清宮懋勤殿中藏貯了兩百多年之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在當年所出「文獻叢編」的第四輯中，將原摺照錄發表了。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兩百多年前王揆等疏奏內容的真相，盡釋心中的疑惑；而且，我們也再一次看破了世宗巧用機心的謊言。

我們讀過了這六篇摺奏，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話是要求聖祖釋放胤禛的，更沒有一點點要求再立胤禛為皇太子的含意。原來「聖祖實錄」中所說的「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揆等不悅，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以及甚麼「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為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云云，都是世宗有枝添葉，改編歪曲的故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春王揆的最後一疏，開始時自然是些聖德神功的稱頌之辭，接下去他是這樣說的：「近更以澤旺阿喇布坦跳梁，出師征討。鴻謨偉略，皆由宸斷。大軍捷書屢奏，收復萬里之絕域，武功之赫濯，自古未有也。……方今儲位尚虛，海內顛顛，想望已非一歲。……今當寶曆六十年周而復始之景運，真數千年未見之昌期。倘蒙斷自宸衷，煥發德音，布告中外，擇吉冊建元良。而萬壽節恭請俯順臣民之請，御太和殿受羣臣朝賀。會見慶溢宮庭，神人交慶。普天率土，倍極歡呼。聖壽無疆，方億萬斯年。青宮孝養，亦億萬斯年矣。……」

原摺中雖未指出皇十四子胤禛之名，但是卻婉轉迂迴的贊揚他。其實，這些人就是想先意承旨的要求聖祖把朝野「心裏有數」的儲君，使它表面化而變成「明文規定」的皇太子而已。所以聖祖雖然認為王揆等也許有「邀榮」之嫌，可是並無深罪他們之意。但雍親王對他們的舉動是「看在眼中，恨在心裏」的，因為如果這些人疏奏之事實現，自然就沒有後來清世宗的歷史了。故世宗登極之後，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才「諭內閣，從前發往軍前之御史陶彝，任坪、范長發、孫紹曾、高怡、范允燾、陳嘉猷、王允晉、高玠、柴謙、吳鎬，給事中劉堂，御史外轉道程鑣，因其在京妄亂生事，故發往軍前効力贖罪。今已行走數年，且大兵已撤。著將陶彝等十三人調回，遣歸原籍。」<sup>65</sup>對於文淵閣大學士王揆，由於他是主謀者，遂要加甚的懲制他，雍正三年加派他的次子王奕鴻並去軍前。當御史陶彝等調回遣歸原籍時，並不澤及王氏兄弟，諭旨中且說，「王奕清、王奕鴻、不比陶彝等，著在阿爾泰一路所設兵站內，自備資用，養贍驛站人等，効力行走。如果盡心

<sup>65</sup> 見世宗實錄卷四十六，頁三至頁四。



効力，朕加恩寬免；若怠忽從事，定行從重治罪。」<sup>66</sup>世宗用折磨他兒子的方法，來傷這位八十多歲老人的心。王揆是雍正元年（1723年）致仕的，但世宗不許他回籍返里（按王揆江蘇太倉人），五年以後在北京去世，卒年八十四歲。當時王奕清、王奕鴻均不得自軍前返京料理父喪，要到世宗崩後，乾隆元年（1736年）時，高宗才把王奕清自阿爾泰召還北京，命「以原官管少詹事」；也把王奕鴻自烏里雅蘇台赦回。兄弟倆在傷痛之餘，返京後乞假葬父，扶柩回籍了。

現在就可知道，六十年初大學士王揆和十二御史的事件，是一半真，一半假的。真的是他們確會上「建儲」之疏，假的是他們並無要求「放出二阿哥」，請再立胤禛為太子的話。這是世宗纂修「聖祖實錄」時欺世的謊言。他把一件事實故意的巧為歪曲，引使後人入於錯覺的途徑。若不是我們得睹這些疏奏的原件，則所謂的「密疏復儲」案就永遠的欺騙着天下；世宗不僅蒙蔽世人，讓我們一直在五里霧中，同時也使王揆委屈含冤了兩百多年。至少撰寫「清史稿」的前輩們，在「清史稿」的「聖祖本紀」和「王揆傳」中，就是在世宗謊言的基礎上來執筆的。

清世宗為甚麼要歪曲大學士王揆等密疏建儲案呢？他的苦心和深意我們也不難看出：正因為皇十四子胤禛聲譽極隆，是當時朝野默喻於衷的皇太子。世宗就借着這一事件把要求再立胤禛為太子的事加插進去混亂視聽，令後人產生一種康熙晚年皇儲確屬未定的印象。這樣，對一年多以後他篡奪皇位的大事，當然會分散了注意，而且也減輕了懷疑。從世宗在這一事件上的做偽，正可以反證出康熙晚年胤禛的皇儲地位了，否則，清世宗又何必為此無的放矢之舉呢？

所以，大學士王揆的密疏也許並非全是為了先意承旨，而是他老練的眼光或已看出了某種危機，例如發現了雍親王與權臣隆科多相勾結一類的事，深恐日後橫生枝節，因此促請聖祖早日把皇儲問題明朗化。若是那樣的話，自更為世宗所忌恨了。但是，由於聖祖對羣臣的擁附邀榮過於敏感，他終於在一種矯枉過正的心情下，拒絕了王揆等的疏請。

不過，也有可能是聖祖認為時間尚非其宜，他要等待愛子西征功成之日，符合了他所說的「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為爾等做主。令爾等永享太平。」的條件時，才做公開的宣佈。而這一宣佈的時日恐亦不遠，因康熙晚年，每屆萬壽節時，羣臣表賀及要求大慶的舉動，均為聖祖所拒，但若至聖祖過七十歲整壽時，將有大慶的

<sup>66</sup> 見世宗實錄卷四十六，頁四。

舉動，自實錄中尚可看出，<sup>67</sup> 相信他已選定此時有所表示。惜乎時間對一風燭殘年的老人是無情的。事實上，自聖祖殞天之日至第二年他七十歲的生日，不過只四個月的時間，誰知這短短的一段時日，卻是他終生不能到達的旅程了。至於對皇儲的安排，也緣於缺少這一簣之功，變生意外之後他的意願成空了。他為臣民所選的「堅固可託之人」，不僅未能繼他成為天下主，而且還淪為階下之囚了。王揆的疏請，豈非有不幸而言中的先見嗎？

## 伍、憂患餘生

胤禛的結局——這個失去帝位，淪為階下囚的不幸王子，他晚年的生活如何呢？他生於康熙二十七（1688年），有「聰明絕世」之譽；<sup>68</sup>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封固山貝子時年二十二歲。在衆多弟兄中最敬佩八兄胤禩，據說當胤禩被譴時，他常懷毒藥與具，誓共生死。<sup>69</sup> 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為撫遠大將軍，代聖祖坐鎮西陲，當時年三十一歲。弟兄中稱他是「才德雙全」的人。<sup>70</sup> 此後三四年的時間，是他雄姿英發，才華展布的時代。不久以前，筆者曾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號的「禹貢半月刊」（第六卷第十二期）上，發現到吳玉年所寫「撫遠大將軍奏議跋」一篇，其將筆者在「從『胤禩』問題看清世宗奪位」一文中引王鍾翰所說「不知何人所輯」的鈔本「撫遠大將軍奏議」的來源，交待得相當清楚。他說：「此書原稿為滿文，前喀爾沁親王貢桑諾爾布所藏。其為蒙藏院總裁時，（按，貢桑諾爾布於民國七年至十六年，即 1918——1927 年時，任蒙藏院總裁）命該院翻譯科譯為漢文，分二十卷。」「跋」中提到胤禛的事功，吳先生說：「允禩雖身未入藏，而籌畫有方，故克奏膚功，甚為神速。觀此奏議，可悉其辦事條理分明，輕重得宜；其籠絡青海各部落，使分兵助戰，以夷攻夷，尤為得計。當準噶爾入藏以後，藏地與中原隔絕，情形尤難探悉，藏人來青海者，無論軍民喇嘛等，允

<sup>67</sup> 雍正元年（1723年）初，蒙古法王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大喇嘛示寂。正月十六日世宗實錄上載有「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原係法教內之第一人。……伊係喀爾喀汗之子，土謝圖汗之弟。遭逢聖朝，疊蒙殊遇。前年聖祖仁皇帝面諭之曰，癸卯年（按是年應為康熙六十二年）朕壽七十，爾壽九十。大慶之年，爾必前來，斷勿食言。」足證聖祖已邀請貴賓參加盛典。

<sup>68</sup> 見文獻叢編第一輯「允禩允禵案」所收「秦道然口供」。

<sup>69</sup> 世宗實錄卷四十五，頁十七上說「聖祖仁皇帝將阿其那領擊發塞塞思黑與允禩懷藏毒藥，願與共死。又令人攜帶鎖鑰從行，以示同患之意。」

<sup>70</sup> 見文獻叢編第一輯「允禩允禵案」所收「何圖口供」。

禩莫不詳細垂詢，奏之朝廷。此類文件爲『聖祖實錄』未載，今得此，可補史乘之未備也。」（吳玉年先生對於「奏議上的胤禛，與史乘上的只備允禩不備胤禛一事視若罔聞，並未感到詫異，不亦可怪乎？」）

這幾年，非但在事功上是胤禛不可一世的時代，我們更相信他即是聖祖書名在遺詔中繼承皇位的人。但好景不長，六十一年（1722年）冬，聖祖的崩逝，也是他命運的轉捩點：他自軍前返京後，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將他拘禁於湯山；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於拘所。四年（1726年），監錮清宮壽皇殿側。<sup>①</sup>如按「永憲錄」所記，雍正八年（1730年）時，或曾一度改囚於圓明園旁關帝廟內。十三年（1735年）秋，世宗去世後，始獲釋放；那時他已四十八歲了。他的壯年生活都是在囚禁中度過的。十三年的監錮，使他「雄心壯志早消磨」，一個生龍活虎般精明能幹、年青有爲，而本應成爲至尊的人，受了這樣的打擊，人生觀如何能不改變呢？

朝鮮對於胤禛事件一直是相當注意的，他們派去北京的使節，時常有零星的關於胤禛的報導。雍正十三年，朝鮮冬至行正使驪善君李學、副使李德壽在第二年——乾隆元年（1736年）歸後給朝鮮王的報告中說：

「十四王胤禛被囚於雍正元年……新皇帝（指高宗）卽位，諭王、大臣、宗人、九卿議寬宥。則皆言事關先朝，不可輕釋。上年十二月，皇帝特旨放之。十三年未受廩俸，一一計給。則王以爲罪籍時廩，義不敢領。留分與八旗軍兵。而王之長子弘春，<sup>②</sup>當雍正時，告王過失，雍正寵之，封以貝勒。皇帝特下旨明其不孝，削職牢囚，方議正律。人心皆悅服云。」<sup>③</sup>

自這段記述可以看出，雖然清世宗在國內盡力推行着「胤禩」（允禩）的假名，可是朝鮮的大臣們於乾隆元年時，依然沒有接受假名，而還引用着皇十四子的真名。另外也可知道，事隔十幾年後，當時的北京，一般人都深知胤禛的冤抑，同情他的遭遇。

清高宗將他釋放後，並在一道訓飭宗室風氣漸流卑鄙的諭旨中，嚴斥弘春說「伊父獲罪監禁，伊反以爲喜。……夫爲人不孝不弟，豈有爲國盡忠之理？」。<sup>④</sup>弘春被革爵後，高宗卽授弘明——胤禛次子，同被囚禁——爲多羅貝勒。乾隆二年

① 可參考中華民國臺灣出版大陸雜誌第四十九卷第二期，莊吉發著「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禩始末」一文。

② 按胤禛有四子：長子弘春，次子弘明，三子弘映，四子弘禮。弘春小名白敦；世宗篡立，威脅利誘之，命訐告其父。封貝子，晉貝勒，一度封多羅泰郡王。

③ 見朝鮮史料同文集考補編卷五，「使臣別單」頁十六。

④ 見高宗實錄卷三，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1737年)封胤禎爲輔國公。十二年(1747年)復封他爲多羅貝勒。十三年(1748年)，再晉爵恂郡王；並時有賚賜。在聖祖衆多的皇子中，他是高宗唯一的親叔父；也許高宗很想對自己父親從他手中篡奪皇位的銜恨，期於不着痕跡中稍加彌補吧。而胤禎則以垂暮之年，萬念俱灰，對富貴權勢看成過眼烟雲了。自「覺羅詩人永忠年譜」一文所引永忠寫的「延芬室全集」裏的記載，胤禎晚年相與往還者如剩山和尚、雪亭上人等等，均爲當時的高僧羽士之流，<sup>⑭</sup>所談者非禪卽道，可以看出他對人生的消極態度。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初六日，<sup>⑮</sup>這個一生多彩多姿，充滿了希望與失望的皇子，在無聲無嗅中去世了。享年六十八歲。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脫稿於澳洲墨爾鉢大學東方系

<sup>⑭</sup> 「覺羅詩人永忠年譜」引延芬室全集文，有「乙未，剩山傳：『我先祖恂勤郡王禮敬剩山；歲壬申（乾隆十七年），余年十八，侍坐，得預聞佛法。此後時時以筆墨往來，因得窺其道要。』……癸巳，題雪亭上人遺照注：『雪亭上人於乾隆壬申秋至京，謁我王祖，祖命忠與之茶話彈琴。上人口占，有「梧桐葉落秋窗下，一對王孫說廣陵」之句。時忠年十八。』」

<sup>⑮</sup> 清史稿列傳第七，「允禔傳」上說他「乾隆二十年六月薨」，是錯誤的記載。今從愛新覺羅宗譜、清皇室四譜、「覺羅詩人永忠年譜」所記，胤禎爲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六日去世。